四川经济日报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民科”到底招惹谁了?

□ 李后强

不知何时,社会上冒出一个“民科”新词。原来我还不知道有这个新物种,是因为听了一个民间故事,才关注“民科”这个概念。传说,一个杂志在匿名送审一名院士的一篇论文时,被审稿人说成是“民科”作品,建议退稿,幸好总编慧眼识珠,把文章发表了,此文后来得了国家大奖。据说这个审稿人事后知道作者是谁了,肠子都悔青了,但事情已经成为“江湖”笑话,传得很远,不可挽回。

判断一篇论文是否发表,不是看学术水平,而是看作者身份,一般要求是博导,最好是院士,还要有国家基金课题资助,恐怕这也是中国学界的独特现象。我的一名研究生写了一篇质量很高的论文,我叫他独立署名去发表,结果是投寄六个刊物都没中,最后无奈加上了我的名字,很快在一家重要刊物的重要版面发表了。年轻的研究生无限感慨,说“没有导师还真不行”!文学界有个真实故事,一个作家得了大奖后,把以往的退稿全部集中成册,全国各家出版社纷纷强烈要求本社出版,作家因此得了一笔好收入。据说,著名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得茅盾文学奖之前都被多家出版社无情退稿。编辑尤其是所谓核心期刊的编辑,往往是博士能否答辩、职称能否晋升、课题能否通过、就业能否实现的关键决定者。我担任学术期刊总编辑和博士生导师多年,遭遇此类滑稽之事太多了。一项具有颠覆性的学术成果,往往超出常人认知,时常被浅薄的审稿人或者高傲的编辑当成“民科”否定,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上会有“民科”这种提法?科学研究还有“民科”与“国科”的差异?我想,问题也许出在我们的文化上,“官本位”作祟!什么东西,都要看看是否具有官方背景。有,就是好货;没有,就是歪货。这种思维,根源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太危险了!会极大伤害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必须批判!

我对于网络新术语研究不多不深,“民科”可能来自“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分。我上网查阅百度,说民科可以理解成民间科学爱好者 ,指那些游离于科学共同体之外而热衷于科学研究的人员;有些置身于科学共同体之中,但从事一些并未列入科研计划的个人也叫民科。有的还说,民科是在非国有科研机构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爱好者。哦,清楚了,体制外的是民科,体制内的是国科。有的又说,民科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也不精通相关领域的科学理论,更没有国家的科研经费支持,但却对科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敢于提出或解决某个重大科学问题的科学爱好者;或者是希望一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的科学爱好者。哦,这类说法,囊括的人员就较多了,对于解决“卡脖子”技术的人员也是个打击,让人更不敢从事颠覆性创新,因为原始创新很多都是“破坏”顶层规则,与守旧的传统科学共同体格格不入,稍不小心就误入“民科”群体。同时,“民科”这种定义牵涉学历和学习了,把知识和文凭当成了划分民科与国科的界限标准。有关媒体总结,民科的特点是,对于探索未知世界有强烈的热情,对于自己的研究非常执著,社会对他们的探索往往缺少必要的宽容;民科一般属于偏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受过高等教育,但努力方向却并不在他所学的专业方面;他们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兴趣而非功利。这种定义的“民科”,几乎囊括了全部科研人员。关于民科的这些定义,他们忘记了一个根本,科研,是人类探索真理的一种激情燃烧,哪有什么民科与国科、私有与公有之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国有机构也不是权威专家说了算,更不是以书本知识为标准,因为书本与专家都可能有错。

一个科研人员,关键是能力与智慧,不是知识与文凭;一项学术成果,关键是突破与创新。2014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只有中专学历的陈学庚院士说,英雄不问出处,谁是英雄,要在“战场”上见分晓。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谁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支持谁。领袖太英明了,说到了关键点上,也为我们如何看待“民科”指明了方向,拿出了标准。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是“民科”或者做过“民科”,比如张衡、祖冲之、僧一行、黄道婆、李时珍等。看当代,仅有中学学历的钱穆、梁漱溟、启功、叶圣陶等成为了学术大师。我们熟知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年轻时也是民科,后来进入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当了教授、研究员;著名数学家陆家羲,是在内蒙古包头工作的非科班的数学爱好者,在贫病交加的艰苦条件下,独自破解了100多年悬而未决的世界难题。在国外的“民科”更多,大家熟知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也算“民科”,他们当时没有官方身份和国家经费;律师出身的费马,却成了迄今无人撼动的业余数学之王;只上了3个月学的爱迪生曾经也是“民科”,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发明家、企业家;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了系统论;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后来成为大陆漂移学说创始人;画家莫尔斯发明了电报,画家达·芬奇留下了数万件发明材料;律师赫维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民科”成为名家或者“国科”成为“民科”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学界为什么不能容忍“民科”?甚至有的人对“民科”恨之入骨,露头就打,四处说坏话,“民科”到底有啥害处?他们不要国家的房子、票子、车子、帽子、位子,自带干粮搞科研,有的贫困交加,有的抱病而逝……他们是在为真理而奋斗。在学术界,有些人还要臭骂他们,打击他们,污蔑他们,良心哪里去了?“民科”到底招惹了谁?“民科”们不外乎就是敬重您,想请教您或者求您看看他的研究成果,可能会耽误您的一点时间,您就那么烦?他们的研究,可能是定性多、定量少,想法多、实证少,错误多、正确少,重复多、创新少,但也可能有很好的思路,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人格和想法。他们没有经费、没有资料、没有助手、没有后台、没有阵地、没有桂冠、没有名气、没有交流,几乎都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要出真理性的大成果的确很难。体制内的专家,往往从学科的角度,对他们的研究持保留意见或者给予否定。“国科”凭借自己的官方背景、国家平台、闪光桂冠、地位优势、资金保障,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但有些人也没有什么原创性成果,几乎都是国外的“跟屁虫”“追风者”,有什么本钱骄傲?只是在“民科”面前耍任性、摆摆谱,实质是内心虚弱,底气不足。

“民科”的优势是没有思维定势,没有框框套套,没有圈子文化,没有门户成见,没有考核压力,敢于大胆设想,挑战权威,开辟新路。著名作家王蒙说过,已有的阅读和知识可能阻碍后来的学习与体验。人们失败的教训都在于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读书少、知识薄、经验缺,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成为创新优势。不少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往往在民间,所以俗话说,高人在民间!

我认识许多著名的“国科”大人物,比如钱学森、苏步青,他们对“民科”非常尊重,对“民科”的遭遇非常同情,力争做到有求必应,每来必见,每信必回,对我很有教育启示。我在学生时代曾向钱老写信请教,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令我意外和感动!我决心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真诚对待每位请教者。有位安徽的年轻“民科”研究相对论,就像一个上访群众,背着水壶和干粮,搭便车赶到成都见我,我组织学术沙龙听他的报告,指出问题,肯定优点,后来他考上了博士生,毕业成为大学教授。有位四川绵阳的老年“民科”,研究超弦理论十多年,差点离了婚,多次到成都见我,我帮助他理清思路,修改论文,出版著作,后来在学术界产生很好反响。我见了几位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量子纠缠、宇宙起源、地震预报的“民科”,我告诉他们,敢于挑战世界难题,勇气可嘉,是好事,但也要量力而行,做好知识准备,他们后来放弃了这种探索,成为了有名的企业家。

有人认为,“民科”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官方对于科学家的宣传和重视有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调,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为国争光,为人类造福,个人的物质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牺牲的。民科的理想主义形成与这种宣传有关联。同时,这种“争光理想”与某些传统思想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及民间多年流行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表现形式上也有一致性,因而民科也可能潜藏着某种功利之心。

“民科”的存在,对民族对社会有利无害。全民创新创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探索科学,是社会文明成熟的体现。民科所作的发明创造对社会可能是有益的,有的“民科”不乏真知灼见,不应给他们戴上“伪科学”的帽子,不能认为民间创新就是“假冒伪劣”。社会和媒体应给民科以更多的包容和尊重。官方的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应该向民科开放,让民科了解科技界的前沿动向,同时也引导他们合理选题,正确行进。

我们建议出台民科相关法律条款,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每年召开民科学术研讨会,让他们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设立相应科研基金,解决民科经费问题;鼓励新闻媒体宣传有真才实学的民科人物,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支持民科与国科合作,推进学术共同体建立;在有关杂志开设专栏,发表民科论文。希望“民科”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图虚名,量力而行,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努力做出货真价实的成果,为自己正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在情感共鸣中激扬英雄气概

——读贺贵成的长篇小说《涌动的羊湖》

□ 周丽

长篇小说《涌动的羊湖》是军旅作家贺贵成继《守四方》《雪域高原》之后,耗时3年创作出的又一部力作,为他的“高原军旅三部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安徽文艺出版的责任编辑,在四五年时间里,我有幸担任“高原军旅三部曲”的编辑工作。

可以说,皇皇110多万字的“高原军旅三部曲”,读来让人心潮澎湃,荡气回肠,感慨万端。用我在《守四方》读后感里的话说:“读完作家贺贵成用满腔的激情、满腔的挚爱、满腔的热血创作反映高原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让我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受到震撼,让我的情感一次又一次受到冲击,心中不禁升腾起一种深深的感动,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滚烫的热泪,为作品中人物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高原军旅三部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高唱时代主旋律,歌颂真善美,传播正能量;集中展现高原官兵的爱国情怀,坚毅执着的战斗姿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及一往无前的奉献精神。

被列为今年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献礼作品的长篇小说《涌动的羊湖》,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武警水电部队在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建设西藏羊湖电站工程为背景,描述了3000多名官兵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水头最高、引水隧洞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系国家“八五”计划期间援藏重点工程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中,笑傲雪域高原,挑战生命极限,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穿越甘巴拉山胸腹,在世界屋脊的“生命禁区”展开了历时8年的大会战,创造了西藏重点宣传“五种精神”之一的“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科学进取”的“羊湖精神”,同时发扬“老西藏精神”,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有着塑造英雄形象、建构英雄话语、弘扬英雄精神的光荣传统。进入新时代,英雄叙事既要守正,亦要创新,贺贵成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英雄叙事就是要守住这个“正”字,理直气壮地扎牢自己的根,旗帜鲜明地张扬自己的魂。为培养新时代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根铸魂,为担当复兴大任的青年一代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艺术的魅力在于以情动人。创作建设工程的作品难度是很大的,弄不好就陷入“见物不见人”的怪圈,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而45万多字的《涌动的羊湖》跳出了这个“怪圈”,它生动描绘了水电官兵建设羊湖电站工程的历史画卷,着力刻画了一批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赤诚奉献,以坚强、无畏、勇敢创造人间奇迹的中国军人的鲜活形象。《涌动的羊湖》是一曲高原军人英雄群体的赞歌,参加羊湖电站建设工程的官兵就达3000多人,但作品只重点写了二三十个官兵的英雄群体,特别是写出了个性的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这部作品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写了羊湖电站建设工程的大背景,写了工程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人力、物力、自然环境等等,但又没有被这些一个又一个的事件所缠绕,没有写建设工程事无巨细的全过程,而是只写了最能表现平凡铸就伟大的军人英雄形象的事迹,特别写了在工程建设中的友情、亲情、爱情,一个“情”字贯穿始终。个人情感命运就像一串串微弱而又顽强的音符,穿行于电站建设工程中,成为整部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和声。人性之爱、战友之情、纯洁爱恋,对国家和民族的牺牲与奉献……这些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构成了小说的主基调,在情感共鸣中激扬英雄气概,使作品散发着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讲好英雄故事,弘扬英雄精神,重点在“讲”,难点在“讲好”,关键是“弘扬”。为了弘扬“羊湖精神”,早已成果丰硕的知名军旅作家贺贵成,依然如闻风在呼啸军号响,精神抖擞地承担起这一创作重任。他敢于受命啃这样的硬骨头,这是相当有胆魄有信心有责任感的表现。文学创作道行颇深的贺贵成怀着对高原军人最真挚的感情,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风尘仆仆、鞍马劳顿地深入采访调查,多方搜集素材,潜心构思,经过八易其稿殚精竭虑的创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精心打磨,才有了这部优秀的、有着独特思想锋芒和鲜明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涌动的羊湖》。文学创作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作者的心血琢之磨之,才能玉汝于成。整部小说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故弄玄虚的噱头,但它情节生动、情感真挚、故事感人,充满科学和奋斗精神,官兵们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业绩,默默无闻却又常常是惊天动地的牺牲奉献,总令我们感慨备至而又唏嘘不已。作品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等手法,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显示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鲜明品格,表达了深沉而厚重的民族情感,写出了厚重且深邃的中国水电铁军的英雄史诗。

典型的人物形象是文学的灵魂。从大大小小的人物故事的步步演进中,作家都有密缝细织的独特表达。作品把国与家、生与死等话题渗透其间,更把爱国主义镶嵌在精神坐标里,共同演绎出动人心魄的电站工程建设的交响曲。每每读到主人公石方竹虽然疾病缠身却以身作则,带领官兵们奋战在一线,并让在华西医科大学毕业的女儿裴婧也上高原,当了一名军医;连长月玉成放下家中年迈的母亲和妻儿毅然来到羊湖电站建设工地;张顺、苏明、吴忠海、杨成钢、刘富盛5名官兵为了羊湖电站工程建设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时,我们为这些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形象感动不已,泪流满面。还有潘登、许林海、李晓明、宁林、高祥、李婷、鞠燕等一系列平凡人物,个个栩栩如生,都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温存和忧伤。故事有根,人物有事,事出有因,这种个性化的细腻写作风格,自然而然地让读者体味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情不自禁为他们的生命故事而动容。作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和颇为冷静的态度,刺破生活的表层直达人物情感的深处,揭示和描绘人物经历的生活与情感的苦痛,以及他们做出的无悔无怨的牺牲和奉献。当这些情感像热泉涌流而出时,是那样震撼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情不自禁而又感同身受地去体察和咀嚼那种甜酸苦辣杂陈的滋味。作品使我们认识到,建设羊湖电站的军人虽然与高原大山荒野相伴,但他们的性格并非粗砺不堪和狂放不羁,相反他们的情感是细腻丰富、内敛隐忍的。他们以巨大的意志力,把种种伤痛坚强地吞下,用青春和生命来书写军旅人生的悲壮和辉煌,来证明军人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具有铁质的人群。这群有血有肉的军人,在风雪中锻造着自己的钢铁意志,把军人的形象、情感和精神大写在雪域高原,使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这部作品思想性、文学性、故事性、可读性强,写出了英雄的光辉故事,也写出了英雄精神的传承故事,让英雄人物和他们的精神品格在文学叙述中真正活了起来。只有塑造出立得住、留得下的典型人物,作品才能有足够的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透过这部阳刚大气、气势磅礴的《涌动的羊湖》,我们不仅深深地触摸到羊湖电站建设工程的始末,更聆听忠诚与信仰共鸣的激昂旋律。

为英雄立传,为民族立心。致敬英雄,致敬作者!2019年8月《守四方》在全国发行时,我写过一篇读后感《用热血谱写高原军人的“大风歌”——读贺贵成长篇小说〈守四方〉有感》,刊于2019年第3期《中外文艺》(大型季刊),文末对作者有一番勉励的话:“文学是一座高峰,攀登没有止境。我们有理由对贺贵成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充满希望!”他确实没有辜负我们的热切希望,又捧出了让人感动不已、潸然泪下的《涌动的羊湖》。今天,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以他的才华、见识与韧劲,今后还会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作者系安徽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

《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之于国产战争电影升级换代的美学意义

□ 峻冰

《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年2月1日甫一上映,便携前作《长津湖》之利势,在票房上一路领跑春节档(截止于2月6日,《长津湖之水门桥》票房已超25亿元);口碑亦不错(豆瓣目前评分7.2分——《长津湖》豆瓣评分7.4分)。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电影的姊妹篇,也作为最新的国产战争电影巨制(隔3个月先后上映的二者总投资13亿元,为国产战争电影之最),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袂执导的《长津湖》与由徐克独立执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无疑是国产战争电影的升级换代之作。之于国产电影的稳步拓进与中国电影强国建设,它们显然具有需要总结的美学意义。

国产战争电影要建构真实可信的战争观

众所周知,战争是残酷的。只要是正常人,无人愿意有战争。人类历史上的不少文明成果多毁于战争,多少鲜活生命也因之罹难。尽管战争(尤其是局部战争)迄今不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强势一方对另一方的武力相向(导致被迫反抗),常是战争遽起的原因。换言之,强加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战争乃是不得不打的战争。

很明显,《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较为客观地展示了中国抗美援朝的实质、意义及真实可信的战地情境。前者开篇对战争已强加于中国这一情势的掠影与剧中人对中国抗美援朝缘由的直陈(如片尾梅生所说:“这场仗我们不打,我们的下一代就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们不再打仗”),都对此作了明确的呈现。特别是两者自始至终对战争参与者的平等对待,即以一种令人信服的视角来审视参战双方(对己方不过度拔高,对敌方也不丑化),实是一种美学进步: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脱出了以往不少国产战争电影过度矮化敌人、拔高自我的窠臼,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褒扬了物质条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敌、保家卫国、敢于牺牲、争取胜利的钢铁意志——片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缺衣少吃、缺重火力、多靠双脚机动的境遇,与机械化的敌方军队形成鲜明对比。

毋庸置疑,两片对实力极为悬殊的参战双方的生死搏杀既宏观又细致的浪漫现实主义再现,是真诚可信的,也清晰地说明了:战争既要靠国家实力,也要靠国家意志、战略部署及参战官兵的勇气、信念、胆识。这是国产战争电影需要秉持也应该秉持的观念:不盲目蔑视实力要素,也不主观抬升意志要素。需要强调的是,为高扬的意志品质所统摄的实力往往能让实力焕发出大大超出自身的抗争力量。

国产战争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

国产战争电影务必讲好中国故事,即要以合乎情理的故事架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新颖逼真的情节细节来震撼人心、打动观众:或触及其兴奋点,或抚慰其痛点,或调动其基于现实情势、历史记忆等的家国情怀,较大程度催生其观赏兴趣、认知欲望,激发由好口碑支撑的观影热情。显而易见,《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已经或正在践行这一为影史一再证明了的叙事与抒情策略。

实事求是地讲,《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叙事线索(国家意志线索、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七连官兵战斗及生活的线索、美军官兵作战及生活的线索三线并举,并以七连的行动线索为主线)是较为合理全面的;敌对双方人物的形塑也比较立体客观:主要人物(如志愿军七连连长伍千里、新兵伍万里及出身七连的三营长谈子为等,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美第十集团军军长阿尔蒙德等)均有血有肉,富有个性。可以说,恰是契合规定情境的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才使两片迸发出充盈的审美魅力。虽然二者以特殊年代伍氏三兄弟的个体命运所引领的“以小见大”的叙事(个人命运见出国族命运)在赢得广泛认同之时,也使影片在宏大事件的全景展现与情节结构的合理营建方面存有不尽人意之处(过度背景化、私人化导致宏大逻辑断裂而使具体事件显得零碎和缺乏有机性)。当然,《长津湖》于此更明显,《长津湖之水门桥》因故事集中于三炸水门桥,着力展示敌我双方斗智斗勇而在叙事的合理性、有机性上大为改观;梅生嘴刁女儿照片驾车拼死冲向敌阵,七连幸存的伍万里拴在树上标识不屈意志的红围巾,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面对长津湖不无祭奠意义的深鞠一躬等细节,既照应前文,也自然有力。

国产战争电影要呈现“有意味”的战争奇观

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提出“有意味的形式”的论断,认为这种“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标识任何艺术都是创作主体按照审美的规律和形式法则对物质世界和情感世界合情合理的把握。无疑,战争电影亦可呈现出“有意味的形式”。

因战争并非司空见惯之物事,电影对它的展现多聚焦战斗场景、战地生活场景(吃穿用行等)及战地情感(战友情、官兵情、婚恋情等)。而这些发生于特定境遇(战地)中的行为和情感富有奇观展现的新颖要素。成功的战争电影多在场景、细节上抓住了它们并予以“有意味”的视听呈现。在较高的审美意义上,只有“有意味”的视听奇观才是具有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的。对当今具有浪漫现实主义风格的国产战争电影而言,复杂的战斗场景与战地生活景观要基于当下观众的欣赏习惯而有所取舍,突出有新意的事件细节和情感要素,使其展呈为“有意味”的形式奇观(宏大奇观和微奇观);在合理性的前提层面,应追求写实基础上的写意神似,而不应以完全意义上的所谓写真生活的形似为旨归,因为这是电影在讲战争的故事,而非战争的又一次在场,尽管假定前提下的具体场景、人物言行及动机都有着逼真而令人信服的面貌。

对《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而言,本文视听奇观的现实主义书写是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环境描写和影像修辞有机结合的;影片也因之具有张弛有致的节奏、新颖贴切的叙述视点、蕴涵深刻艺术感染力的典型环境和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正因影像奇观与细节密度的相得益彰,二者才有了“有意味的形式”。无论是敌机扫射砾石滩、敌机投掷燃烧弹等场景,还是子弹击中炸药包爆炸、敌我击发的坦克炮弹摩擦出火花等景观,以及伍万里收藏的红围巾、冻硬的熟土豆、梅生女儿的照片等细节,乃至于谈子为对伍万里所说的“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的话,准备拼死进攻的七连官兵面朝祖国的方向一边敬礼一边说“新中国万岁”,片尾曲《天地我来过》对“是战斗的使命,召唤我”“是军人的荣耀,激励我”“记住我,我来过,我爱我的祖国”“我来过,燃烧我,我身后是祖国”的反复咏叹,都令人震撼、回味。它们有力地凸显了战争本质,烘托了人性与情感,增强了影像叙事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国产战争电影要揭示题旨的哲学深度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乃当今世界主题。有着“东方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历来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乃中华传统美德,其核心可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自然而然,为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的国产战争电影,在阔广的题旨层面,理应彰显礼义、仁爱与和平的思想。

无疑,战争并非解决人类争端的最佳选择。或者说战争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手段,其目的是“以战致和”——在终极意义上,和平是战争的目的。各国和平共处,不同种族的人们安居乐业;彼此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应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愿景。

应该说,《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在哲思意义上指向了人类和平与种族大爱(伍千里制止伍万里再次开枪射击重伤垂死的北极熊团团长,并说“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即是明证),也契合具体叙事情境服务于英雄礼赞的人性人情呈现与家国同构的宏大主题有机相融。有着明确意识形态诉求,也有着显明宣教认知功能的两片,在趋同大众文化心理之时,亦复刻出已成历史但依然可触可感的活的战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及穿行其间的活的人与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让人深刻体悟到生命个体与祖国母亲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家国共同体”的想象实为二者题旨所依托的基本语境;它们成功的浪漫现实主义书写,建构了题旨的哲学深度和观众的审美宽度。显然,这也是它们能快速掀起观影热潮的主因。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四川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本报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136号 本报法律顾问:何佳林 13908228502 办公室:028—86632091 总编室:028-86641711 028—86646411 地方新闻部:028—86242769 广告经营中心:028—86642864 邮政编码:61003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每份零售价:1.6元 本报激光照排 成都兴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